

香港司法機構需明確自身憲制地位

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日前發表題為《是时候緊急改革了》的文章，其中的一句話令人心情沉重：「在司法機構的運作方面，香港顯然已失去北京的信任。」為什麼會這樣呢？烈顯倫先生在文中列舉了許多案件，如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剛果案、立法會議員宣誓案、「一地兩檢」案，尤其是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去年11月判決的「禁蒙面法」案，說明中央對香港的司法機構失去信心，責任在於香港的司法機構。

在基本法起草的日子裏，草委們似乎對香港的司法機構寄予厚望。基本法第2條規定了「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一改港英時期香港終審權在英國的做法。為了使香港普通法能夠順利運作；基本法第82條允許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基本法第91條允許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以外的其他司法人員原有的任免制度繼續保持。換句話說，外籍法官可以繼續在香港行使司法權，這是非常特別的待遇。即使港澳辦及中聯辦發聲明澄清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仍然重申香港的司法獨立。

中央政府十分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那麼，司法機構又是如何履行自己的

職責的呢？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司法實踐已經给出了一些答案：一些法官在重大的憲制問題上迷失了自己，找不準自己的定位，或是將自己凌駕於全國人大之上，或是如烈顯倫先生所說的「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這從憲制安排上是說不過去的。

特區法院一再挑戰全國人大

將自己凌駕於全國人大之上的典型例子就是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的判詞中寫道：「特區法院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去審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以及倘若發現其抵觸基本法時，特區法院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去宣布此等行為無效。依我等之見，特區法院確實有此司法管轄權，而且有責任在發現有抵觸時宣布此等行為無效。關於這點，我等應藉此機會毫不含糊地予以闡明。」毫無疑問，終審法院的這個立場超越了基本法所賦予終審法院司法權和終審權的範圍。

面對質疑，終審法院不得不在1999年2月26日作出澄清：「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詞中，並沒有質疑人大常委



以法論事
顧敏康

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及如果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時，特區法院必須要以此為依據。我等接受這個解釋權是不能質疑的。我等在判詞中，也沒有質疑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的條文和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式行使任何權力。我等亦接受這個權力是不能質疑的。」儘管如此，終審法院這種對司法管轄權的自我擴展已經給人留下負面印象。

其實，問題並沒有結束。終審法院有法官不僅希望凌駕全國人大，而且希望限制全國人大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例如，原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2012年10月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強調：「基本法賦予終審法院有權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但終院主動提出以外，其他釋法都是錯誤。」但是，他恰恰忘了，終審法院在劉港榕案中早已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因為此項權力來自憲法第67（4）條，並載於基本法第158（1）條。而第158（1）條賦予的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是全面的和不受約制的權

力，並無在任何方面受到第158（2）和158（3）條限制或約制。

而將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位置的典型例子就是去年11月判決的「禁蒙面法」案。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宣稱《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法」）抵觸了1997年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憲制秩序」。按照烈顯倫先生的觀點：「上述法院對『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遲鈍得令人瞠目結舌。在效果上，這些法官通過決定香港的憲制秩序應該如何，而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難怪這個判決立即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激烈批評。」

司法獨立豈可變成司法獨大

後來，上訴庭推翻了這個判決，裁定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規例「合憲」，以及「緊急法」部分「合憲」。同時也批准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請求。面對這樣一個重要的憲制問題，終審法院如何裁定，值得關注。

再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就是法官在處理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相關案件中的立場問題。按照烈顯倫先生的

觀點：「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這給了那些走上街頭暴力抗議的人一種個人主權的感覺。保護大多數人的法律被破壞，卻沒有懲罰，因為這些人認為自己的個人訴求是至高無上的。實際上，法院在過去一年裏幫助創造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這是十分深刻的評論。

事實上，這種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性地扭轉。香港有個何俊堯裁判官，此前因判處多宗「修例風波」相關案件被告罪名不成立，引起大量市民投訴。處理結果是什麼呢？何官被調任高等法院專責處理原訟庭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職銜為「刑事案件排期法官」。可千萬別輕視這次調任，因為何官不僅被加薪，而且對有關「修例風波」案件的安排有決定權。司法機構如此作為，如何令人信服？

可見，香港的司法機構如何挽回中央、乃至香港大眾的信心，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筆者不希望看到香港的司法獨立變成司法獨大，更希望看到司法機構明確自身的憲制地位，為香港的法治盡忠職守，確保每一宗案件都獲得公正和迅速的處理。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司法獨立不等於「三權分立」

教育局刪除教科書中的「三權分立」表述，得到特首的表態支持。同時引起了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很多市民不知就裏，不明白「三權分立」的意思，甚至有人認為是無謂之爭。其實這個爭議涉及如何理解特區的政治體制和基本法的重大問題，因此楊潤雄局長和林鄭月娥特首有必要就「三權分立」的錯誤表述予以糾正。

反對派錯誤堅持香港是「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目的是要抬舉和擴大司法機構和立法會的地位和權力，限制中央透過特首和行政機構依照基本法行使應有的權力，並削弱特首根據基本法第48條第2款的規定「負責執行本法」的權力和責任，致使行政長官如發現立法會或司法機關違反基本法時，難以加以糾正。

「三權分立」的概念宣導者是著名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根據他所理解的18世紀初期英國憲法的內容提出。200多年以來，歷史的變遷、制度的發展、地域的不同，已經使這個概念變成一個抽象的政治理念和法律原則，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因此，我們不可以用這個模糊的概念來代替基本法訂明具體明確的制度。更不能容許學生被誤導。

一般來說真正的「三權分立」，需要行政、立法和司法各機構，享有同等的憲制地位，同時各機構的成員不能交叉；機構各司其職；互不干涉。鄧小平明確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



議事論事
劉漢鈺

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他亦說：「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因此，不搞「三權分立」這一套，早已體現在基本法起草和具體內容。

日前「兩辦」發表聲明，指出香港實行的是行政主導，三權分置、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三權分立」在香港從來沒有存在過。

不容擴大司法權貶損行政權

特首指出，香港的政治體制不實行「三權分立」，她強調按基本法行政主導的架構，特首是履行中央授權的核心。特首的說法是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的。其中包括基本法內眾所皆知的如：

第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意味着行政長官是特區各機構，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的首長）

第7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政

府政策的重要提案權，由行政長官掌握）第8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這表示行政長官同時行使司法機構的委任權）

基本法這些條文，明確「三權分立」並非特區的政治體制。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立法、司法各機構各司其職，互相制約又相互配合。司法獨立體現在法院獨立審判，不受干涉，與行政主導並不對立。事實證明在沒有「三權分立」的普通法國家也可享有司法獨立。

當年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在籌備香港特區成立工作上，也是根據以基本法內容為基礎實行的行政主導，而不是實行「三權分立」作為工作原則。種種事實擺在眼前，仍有一些法律專家和政治人物高唱反調，真是匪夷所思。還有一些人，把一些知名人士有關香港「三權分立」的論述以偏概全，斷章取義，誤導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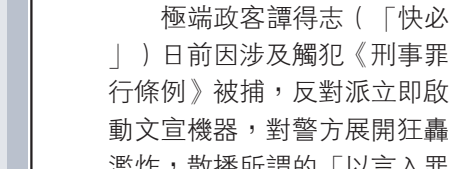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已清楚列明。基本法是要嚴謹執行和遵守，更不可以企圖擴大立法權及司法權，削弱行政權和貶低行政長官以達至其政治主張。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導政府就過往公眾對「三權分立」、行政主導等議題的錯誤理解，正本清源是有必要的，並充分體現行政長官的職能和責任。

希望本屆特區政府藉本屆特首的明確態度，大力宣傳正確資訊，否則市民被謬論潛移默化，把香港的發展推向歧途，將嚴重損害香港的穩定繁榮。

前全國政協常委、律師會前會長

「聲大夾惡」就可以凌駕法律？



有一說一
沈家聰

極端政客譚得志（「快必」）日前因涉及觸犯《刑事罪行條例》被捕，反對派立即啟動文宣機器，對警方展開狂轟濫炸，散播所謂的「以言入罪」、「動用生鏽法例」、「逼港人噤聲」等謬論。昨日譚得志的「拍檔」、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更舉行記者會，意圖轉移視線，將「有沒有犯罪」的問題，轉向「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問題。顯而易見，反對派意圖以這種亂扣政治帽子的做法，為日後煽動言行卸責。但犯法就是犯法，法律就是法律，並沒有生不生鏽的問題，反對派聲音再大、態度再惡，難道就可以凌駕法律？

譚得志最終有沒有違法需要法庭來判，但有些客觀事實是無法否認的。據警方提供的資料顯示，譚得志有大量的涉橫違法的言論，包括在街頭中叫喊「光時」口號389次、「黑警死全家」324次、「打倒共產黨」34次、「831打死人」和「10月1日槍殺人」154次等等。

禁煽動性言論是世界標準

其實，但凡對普通法有所了解的人都應該知道，像「黑警死全家」這樣的仇恨言論，講一次、兩次或許可以脫罪，但講了數百次，就不是「言論自由」可以開脫的了。首先，《刑事罪行條例》已經有明確規定；其次，這完全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該公約第二十條規定：「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

法律禁止之」，說明所謂「以言入罪」並非必然違反人權。最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規定。

以美國為例，1964年美國詹森總統簽署了民權法案後，產生了一個「憎恨言辭」或稱為「偏見言辭」這個新名詞。1969年，聯邦政府又制定了一條「憎恨罪」法律，由各州再立法去執行。其實「憎恨言辭」是一個很有爭論的名詞，但其目的是用在保護少數族群。凡是對於種族、人種、國家起源、宗教、性別偏好或殘障人士用特別蔑視的言辭來傷害或恫嚇，就會構成「憎恨罪」。在美國社會中，特別是政界，談論種族問題是一大禁忌，所以政客或政治家對「種族議題」噤若寒蟬。有些人發言不慎，就會引起很多糾纏不清的後續問題，如：丟官、遭解僱，甚至上法庭、罰款及坐牢，這就是美國民間流傳的「黑色恐怖」。

再以德國為例，同樣明確禁止煽動仇恨的法律，其言論自由的邊界在於，它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與尊嚴。2011年，弗萊堡地方法庭就以此判決一網民犯有煽動民族仇恨罪，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罰款1200歐元。2014年6月，一名32歲男子因製售印有「不是猶太人」字樣的T恤，也被法庭判處了2年9個月的有期徒刑。

上述法律與事實說明，煽動性言論在世界各國都是被禁止的，即便美國、德國都如此，但這絕不代表「言論自由」受到破壞。

時事評論員

香港必須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最近，關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是否「三權分立」的爭論，是香港回歸以來一直存在、隔一段時間就形成爭論熱潮的一個老問題。其理論和法律根源，在於香港回歸是平穩過渡，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既部分體現對九七前的沿襲，也部分體現從港英專制向現代民主轉變。

反對派圖架空中央權力

我一直認為，對香港和香港建制居凌駕地位的唯有中央，香港是實行中央直接領導下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視特區政制為「三權分立」，雖然能從基本法體現「從港英專制向現代民主轉變」的條款中找到依據，卻是以偏概全，他們的目的，是企圖把香港政制發展引向所謂「真普選」而架空中央對特區的領導。

因此，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固然必須義正詞嚴地批駁所謂「三權分立

」是對特區政治體制的曲解，但更重要的，是必須引導和推動香港社會各界，盡快擺脫新冠肺炎疫情陰霾，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時俱進實踐「一國兩制」，是對「拒中抗共」政治勢力最有力的打擊和最徹底的遏制。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促使香港為數不少的居民改變舊觀念，實現人心回歸。

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接連講了5個「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和醜化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



知微篇
周八駿

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裂金斷石的鏗鏘之言所表達的，是對美國向中國發動「新冷戰」的大無畏的應對。堅決挫敗美國對華「新冷戰」，是香港必須參與的國家發展大局的總目標。美國千方百計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難道香港一些人繼續鼓吹「三權分立」、「真普選」來為美國效力？最近，我反覆強調，在新形勢下，反對派必須摒棄「真普選」等政治口號，樹立尊重

和維護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政治氛圍。

在新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國家走向新發展階段。8月24日習主席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

避免經濟跌入蕭條深淵

與新發展階段相適應，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習主席9月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上指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要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習主席提出，要把握構建新發

展格局同實施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銜接起來，在有條件的區域率先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8月20日在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上，習主席提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要緊扣「一體化」和「高質量」兩個關鍵字。就「一體化」而言，長三角顯然領先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發展也易於大灣區。無論就大灣區一體化還是高質量發展而言，主要障礙都來自香港。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被「黑色革命」和疫情遲滯了逾一年半，疫情仍未受控，遲滯還在繼續。如果今年年底特區政府建立了有效防控疫情常態化長期化的機制，內部不能恢復經濟和社會正常運轉，對外不能恢復人員正常交流，那麼，香港不僅無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甚至面對空前嚴重的經濟衰退勢必跌入蕭條的深淵。勿謂言之不預。

資深評論員、博士